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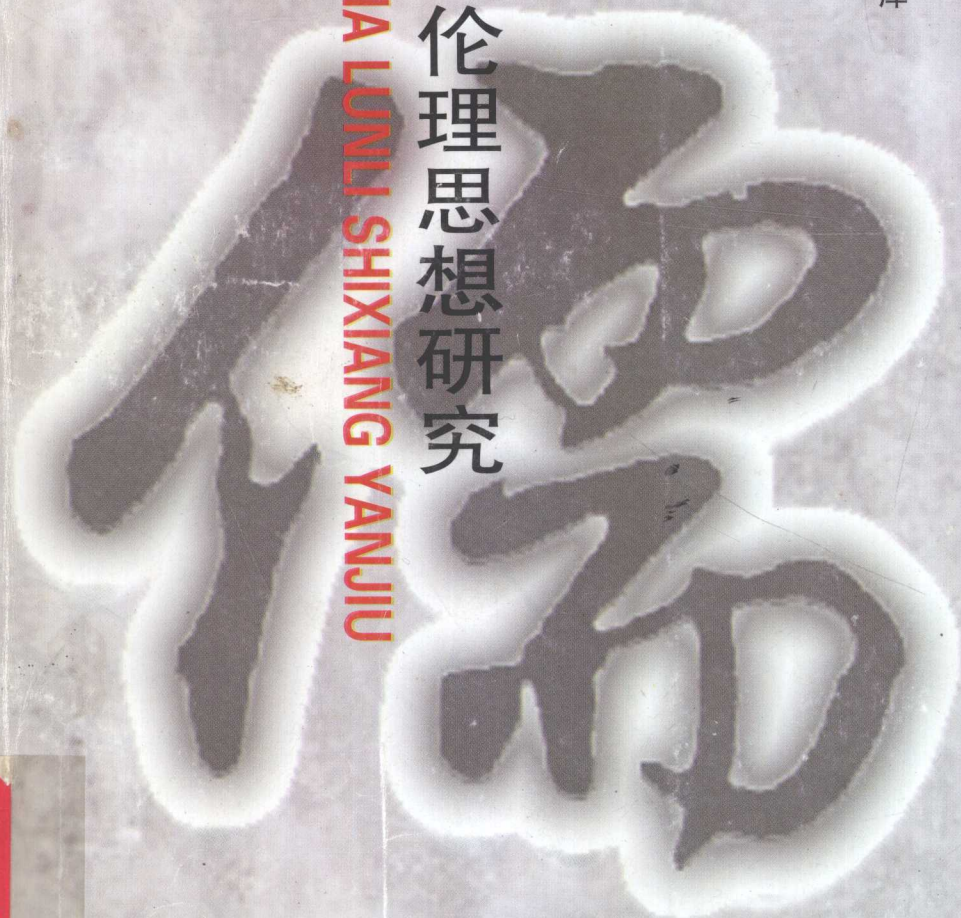
湖南师范大学中青年学者文库

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研究

XIANDAI XINRUJIA LUNLI SHIXIANG YANJIU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泽应 著



Z01315010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著系列

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研究

王德山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研究

王泽应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研究

王泽应 著

责任编辑:徐新平 赵士启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卫生厅机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 11印张 276千字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81031—559—5/B·025

定价:16.50元

序

唐凯麟

为人著作写序本身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为一个既是自己的学生又是自己的同事且关系非常密切的人的著作写序是尤为艰难的。几个月前，当王泽应同志送来一大摞手稿请我审阅并嘱我写一序言时，我即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既愿意为其写序又害怕为其写序的矛盾性情结之中。后来，我读了书稿的大部分章节，还是未能拂去横亘心头的种种困惑。一方面，作为该著的第一位读者，我深为其所显露出的精思睿识所感动，觉得有责任向广大读者和同行推荐，另一方面我不仅怕自己在写作过程中受情感的影响妨碍理性的分析，而且更怕同行和读者的审视和测度，所以我一拖再拖。几个月过去了，他的书稿三校已毕，而我在征求其他一些同道意见后，在“内举不避亲”伦理精神启迪下，也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或许，一个人的伦理气度总是要借助于对自己关系特别密切或十分疏远的人的对待而呈现出来的。只要立心于伦理学术本身，尽量以理驭情，公正客观地评价，不管关系如何，总会赢得广大读者和同行的理解与信任。

泽应同志治学是非常广泛的。在伦理学领域里可以说古今中外他都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如果把他的研

究成果开出一个清单来,那在他的同辈人中用“相当可观”四个字来形容,恐怕不会过分。四年前我接受了一家出版社的约请,担负《20 世纪中国伦理思潮》一书的研究和写作任务。但是由于忙,我一直身不由己,无法按期完成,后来只好征得泽应同志的同意,由我们俩人合作来啃这个“酸果”。讲到 20 世纪中国伦理思潮自然离不开现代新儒家这一派。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泽应同志收集了大量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资料,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和剖析,心得颇多,只是由于我们合作的这本书毕竟不是一部关于新儒家研究的专著,并且篇幅有限,未能使他把这方面的研究心得一吐为快。这大概是他写这部《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研究》的最初的冲动。我们合作的书交稿以后,他便马不停蹄地对现代新儒家的伦理思想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他的这部专著的推出,可以说是他前后四年来对这一课题的一个全面而系统的阐发,四年磨一剑,也算得上是一部力作了。

现代新儒家是 20 世纪中国重要且具有深远影响至今还在发展的学术思想流派之一,是在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儒家文化受到“明暗夹攻”(杜维明语)“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历史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试图以挖掘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弘扬儒家文化的“真精神”,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的学术文化思潮或流派。现代新儒家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新儒学和华化或儒化西洋文化,实现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换为主要特征,它旨在对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民族性与世界性作出自己的解释。经过 70 余年几代新儒家传人的上下求索和不断努力,特别是随着环太平洋或东亚经济圈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地位的上升,现代新儒学已成为一种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学术文化思潮。儒家思想文化由此而从沉寂走向复苏,各国不少学者竞相注目于中华文化圈,探讨儒家思想文化与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及其同 21 世纪人类

文化发展趋势的关系。目前,现代新儒学研究在海峡两岸,在北美华人圈乃至在欧洲,正形成一股潮流。中国大陆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也高潮叠起,出版了一大批现代新儒家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但是,有关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研究的著作,却至今尚不多见。

现代新儒学本质上是一种道德文化哲学,伦理思想始终是现代新儒学理论的核心。就主观而论,现代新儒家的许多代表人物确实具有一种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人生使命感,他们围绕现代人如何安身立命、挺立道德自我、建树自主人格等问题殚精竭虑,苦苦思索,写出了一系列的文章和著作。他们从区分科学和玄学的思维视角起步,为伦理道德和人生问题争独立的学术空间,希冀破除科学万能论或唯科学主义的弊端,高扬伦理道德的地位和价值。他们认为儒家伦理文化自有西方文化所不能企及的高明之处,并由此提出“返本开新”的理论纲领,主张从内圣开出新外王。他们研究了道德与生命价值、主体精神及其与经济、科学技术的关系,研究了道德原则、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诸多方面的问题,并建立了自己颇具特色的道德本质论、道德原则论和道德修养论,使其伦理学说成为 20 世纪中国伦理文化的重要一脉。

泽应同志的《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研究》一书,从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的内在关联和理论统系出发,试图对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作全面的开掘与系统的整理,以建立研究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的框架体系。这与时下那些仅仅着眼于从时代或按人物阐释现代新儒家思想的著作相比是颇具特色的。泽应同志的这部专著在对现代新儒家思想的历史成因、发展进程等作出了一般性介绍之后,从宏观总体上较深入地阐释论述了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的理论特质,即科玄分途的伦理思维模式、道德形上学的理论建构、安身立命之道的价值求索、活水源头的伦理开掘。然后它又分别从道德

基本理论、道德原则规范、道德行为品质、道德修养和伦理道德现代化等方面着力探讨了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的具体内容。并在这种探讨中,作纵横交错的比较评析,多层面地论述了现代新儒家的道德本质论、道德原则论、道德品质论、道德修养论和伦理开新论。最后,又从跨世纪伦理文化建设的高度全面总结和评价了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的经验教训及学术地位,分析了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与20世纪中国伦理思潮的关系,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和人类伦理学发展的未来的关系。还应该指出的是,泽应同志的这部专著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努力结合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及人类伦理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具体地分析论证了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的优长缺失,探讨了其贡献及局限性,体现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开放视野。它由史及论、史论结合,观点与材料融为一体并使中西伦理文化交融互渗,传统伦理精华的提取同现代伦理要义的阐发相得益彰,探析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的内蕴与构成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目标与任务有机结合。据此,我有理由认为,泽应同志的这部专著不仅具有伦理文化统贯和传承的继往开来的史的意义,而且具有一定的拓展深化当代道德哲学研究的论的价值。

当然我觉得,泽应同志的这部专著也有值得商榷和进一步推敲的地方。例如:由于受既定框架的影响,它对现代新儒家一些人物关于良知、道德自我以及伦理类型论未能作出应有的介绍与评述;对马浮、钱穆等的伦理思想也未能综合概括或作出必要的理论阐释等等。对于这些,我的认识是,对一位青年学者来说,他已取得成果,着实难能可贵;而存在的缺失也是不难理解的。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今后的努力中更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研究。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现代新儒家的伦理思想上承数千年儒家伦理思想的统系,下开近百年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现代化的先河,并在回应西方伦理文化的挑战中吸收西方伦理文化的精华,试图谋求儒家伦理思想的新开展,体现着融古今中西于一炉的理论特点,在一定的意义上成为当代中国伦理致思和道德建设的重要背景。因此,无疑是最需要研究也应该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泽应同志《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研究》一书的问世,将有助于推动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并使之深入发展。愿当代中国伦理学界的同仁们能够
从新儒家伦理思想中总结应有的经验教训,吸取必要的理论营养,以促进中国伦理学真正走向世界,为人类伦理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是为序

一九九七年元月于岳麓山下

前 言

20 世纪对儒家伦理文化而言是既不幸又幸运、既寂寞辛酸又悲壮雄浑的世纪。言其不幸是因为它在与西方伦理文化的碰撞交锋中屡遭失败,并因此而受到明暗夹攻即既受到“五四”主流知识分子的猛烈围剿与尖刻批判,又受到一部分最有权威的军阀政客的阉割肢解与恶意利用,其命运不可谓不惨;说它幸运是因为儒家伦理文化在 20 世纪毕竟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经历了时代和社会的变迁,特别是经过现代新儒家“透至底层”、“直接潜流”、“引发源头活水”的创造性工作,终于重现生机与活力,再度泽被人类,以至于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士断言:太阳将重新从东方升起,21 世纪是中华伦理文化异彩纷呈并造福环宇的世纪。

儒家伦理文化在 20 世纪前后的不同遭遇及其命运,既与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竞争此消彼长的态势及各种力量对比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现代新儒家振衰救弊,承亡继绝,坚信儒家伦理文化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进而挺身而出对全盘性反传统和全盘西化运动作直接回应的不懈努力有着内在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现代新儒家复活和光大了儒家伦理文化。面对着近代以来儒家伦理文化花果飘零的惨状,现代新儒家既忧心如焚又奔走救世,他们决意挽狂澜于既倒,替孔子学说争一席之地,延续儒家伦理学脉,阐扬儒家道德的真精神,创造性地重建儒家伦理道德传统。为着解决伦理文化建设上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诸问题,他们一方面向历史作掘井汲泉的开发工作,“直接中国文化之潜流,去其土石与沙砾,重显其源泉混

混、不舍昼夜、健行不息之至德于光天化日之下”，使儒家伦理文化的真精神“自混沌中昭露以出，而光辉弥以新”^①；另一方面向现代作博采众家之长的吸纳工作，了解并把握西洋伦理文化的优劣长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谋求儒家伦理思想的新开展。他们强调伦理文化的现代化是全球意识与民族意识的结合，并认为现代化不只是西方化一条路，东方民族同样可以有而且也应该有自己的现代化。诚如牟宗三所说的，每一种伦理文化系统都既有世界性又有民族性，因为它既是人类伦理文化的共相，又是各民族伦理文化殊相的自我表现。中国伦理文化与西方伦理文化既有类型之别，各为一独立自成的伦理文化系统，同时又有价值之别，各自代表一种独特的伦理情趣和人生境界。人类伦理文化既需要西方“有执的存有论”或“离教”，也需要中国“无执的存有论”或“圆教”，既需要西方“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和对自然的把握，也需要中国“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和对生命的把握。以生命为出发点和中心的中国伦理文化是“仁”的伦理文化，它重在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突显的是性命天道相贯通。以自然为出发点和中心的西方伦理文化是“智”的伦理文化，它重在向外用功和对自然的征服改造，突显的是理智自我与功利效用的观念。比较而言，西方伦理文化是一种人生的低境界，因为“执”意味着心有所碍，俗累未断，中国伦理文化则属于人生的高境界，因为“无执”意味着空灵无挂，天人合德，从“执”到“无执”，从“自然”到“生命”，从“智”到“仁”，既体现为人生修为的两个步骤，亦体现为人类伦理文明发展的两个阶段。儒家伦理文化之所以可能在当今世界凸显其人文价值和道德价值，其内在的根据就在于此。当然，中国伦理文化和西方伦理文化均各

^① 唐君毅：《中国未来之文化创造》，见《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现代篇3》，台湾牧童出版社1978年版。

有其缺陷,中国伦理文化是有道统而无学统,故中国伦理文化的开新是摄智归仁,西方伦理文化是有学统而无道统,故西方伦理文化的发展必须是以仁御智。中西方伦理文化理应互相交融互相补充。儒家伦理文化的现代化在于从道统的肯定开出学统与政统,即从内圣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

现代新儒家既主张中西伦理文化的互相吸收与融合,但同时又强调中国伦理文化在本质上高于或优于西方伦理文化,主张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伦理文化,认为“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① 儒化或华化西洋伦理文化,一方面表明现代新儒家不同于抱残守缺的伦理复古主义或国粹派,表明现代新儒家面向世界的开放心胸或情怀,另一方面又表明现代新儒家不同于失去自我的民族伦理虚无主义或西化派,表明现代新儒家尊重历史的理性态度。在现代新儒家看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把根扎在自己民族伦理的深厚土壤里长出来的伦理之树才不会被狂风暴雨所摧折,才有可能向外吸收各种营养、阳光、雨露而枝繁叶茂。钱穆指出:“倘使一民族本身无文化,专待学别人,其前途必有限,其希望亦黯淡。我们是自己有文化,而且这一套文化又发展得很丰富,很博大,很精密,深入人心,牢不可破,一旦要全部丢掉去学他人,其事更难。”^② 现代新儒家主张在畅通儒家伦理文化传统,挺立民族道德自我的基础上会通西学,吸收西方伦理文化的精华,以实现儒家伦理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诚如王邦雄所指出的,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三大壁垒”的对抗之外,政治体制上能有积极建构而

①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页。

② 钱穆:《中国文化十二讲》,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2页。

兼取中西之长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文化思想上能畅通自家儒学传统,并进一步求以会通西学的,则是当代新儒家的文化慧命。”当代新儒家不是自由主义者,更不是激进主义者,相对于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和激进主义的俄化派而言,他们是保守主义的传统派,但他们并未有国粹派、保皇党及保教派的排外意识与封闭心态,而是挺立道德理性与文化理想,求以返本开新,畅通民族文化大流的理想主义者。“综观中国当代的思想流派,虽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众壑争流的局面,然真正能切应时代问题,又能为传统文化开展蓬勃生机与创发活力的,只有新儒家。”“新儒家就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由畅通民族文化的本源大流,以消化当代西方新潮的奋斗。”^①

针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特殊的二律背反运动即一方面求民族自存另一方面在文化上作不遗余力的自我否定的现象,现代新儒家强调民族的自救既是物质的形体的亦是精神的文化的,必须使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两足同时站立起来,才是“中国从西方之侵略中站起来的根本方向”。唐君毅指出,要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则“中国文化与中国民族,必须两足同时站立起来,不能跛脚以站立起来。”^② 因此民族的自救与民族文化的自救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情,必须同时兼顾,缺一不可。鉴于近代以来在民族文化上作不遗余力的自我否定的局面,现代新儒家更强调民族文化的自救是民族自救的根本,认为“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其主要的潮流、根本的成

① 王邦雄:《当代新儒家面对的问题及其开展》,《当代新儒家》,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01页。

②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中国现代社会政治文化思想之方向及海外知识分子对当前时代之态度》,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

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换言之,儒家思想的命运,是与民族的前途命运,盛衰消长同一而不可分的。”^①在现代新儒家看来,中国近百年以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因此,要拯救我们的民族,首先莫过于拯救我们民族自身的伦理文化。只有彰显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伦理文化思想,挺立了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道德理性,亦即护住孔孟所开辟的人生道德之大本大源,再吸纳西洋伦理文化的精华以补充之完善之,实现返本基础上的开新,才会真正赢来民族复兴和民族繁荣的新时代。

出于对返本开新的强调,现代新儒家认为现代与传统并不是截然割裂的对抗的,而是互相关联的,“重建现代的中国,从事实与理论上来说,根本不可能与传统文化一刀两断。”“无源的水,不能成江河。”所以他们十分注重寻找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点,主张开掘传统伦理的源头活水以浇灌现代,同时立足现代去重建儒家伦理传统。成中英指出,重建儒家伦理传统的理由既源于文化的需要又源于开创未来的需要。儒家伦理“是植根在中国历史的和文化的土壤里的一种价值创造,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项重要贡献。”“在当今的寻根和本源认同的需要下,儒学的重建自我有继往开来的作用,以及‘立足中国,开创世界’的生命意义。”同时重建儒家的伦理传统是为了开创儒学未来,“对发展中的人类社会和具体的人性需要提出理想和实现理想的建构。”^②

^①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第4—5页。

^② 成中英:《现代新儒学建立的基础》,《知识与价值》,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328页。

在全球性的人文理想崩落和道德价值迷失的情境下,重建儒家伦理传统无疑有助于振衰救弊和解除现代社会中的道德精神危机,有助于贞定人心和弘扬道德的尊严。儒家伦理传统中崇仁尚义、贵道敬德的观念和特重道德主体性人格独立的价值系统,无疑是现代社会反物化和抑制精神危机的有力武器。现代新儒家通过重建儒家伦理传统的努力,突显了人伦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本根性地位或支配性地位,强化了精神自持和自善其身的伦理意义。现代新儒家相当清楚地意识到,人生需要科学和工具理性,但不能使科学和工具理性主宰人生,生命是大本大源自根自蒂的东西,容不得物化和工具化。人生的意义在于对生命价值的开掘与体验,而不在于追逐身外之物。因此他们反对把生命本真缚在科学的车轮上,反对将心物化、将人工具化。他们主张对功利物欲保持一定的警戒性和自制力,使人成为功利物欲的主人而不是奴隶。在现代新儒家看来,当今之世对人类最大的威胁是人生意义的失落和非人性化的倾向,是勘天役物和普遍商业化风气所造成的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失衡。要解决当代社会人文精神失落和道德意义危机等问题,就必须倡扬和发展儒家的伦理文化传统,“以人文价值统御科学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够“造福人群,不至于使人流为机器工业或者现代经济制度的奴隶。”如果我们能将儒家“仁心的托付与生生不已的精神贯注在现代科学人文的成果之内,则生命不至于流落到无意义的境地。儒家之能解决个人内在安心立命的问题,实在可以解决现代破除迷信以后的宗教信仰与终极托付的问题。”^① 中国文化中的终极关心问题是如何成德、成就人品的问题,它是属于人类生命根本方向与智慧方向的问题,是人道之尊的总根源和生命价值的总根源,人性的尊严和人格的尊严均由之而

^① 刘述先:《儒家哲学的现代意义》,《中国文化论文集(一)》。

得以挺立。可以说,推崇道德或向往成德成圣是中国文化生生不已的“动原”,也是中国伦理文化能够造福于现当代的内在原因。

现代新儒家的伦理思想不仅强调科学与人文、功利与道义、人欲与天理的平衡或结合,而且主张在结合的基础上突出人文、道义、天理的价值,倡导“以人文价值统御科学的成果”,使功利服从服务于道义精神的弘扬。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目的论与责任论、功利论与道义论的融合,带有兼重功利与道义、人欲与天理、为私与为公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又是一种新的更高层次的责任论和道义论,它强调了道义的价值高于功利的价值,突显了人文精神对科学精神的统御作用。亦如熊十力的思想既高扬体用不二又宣称性智高于量智一样,本质上并未脱却中体西用论的窠臼,带有浓厚的道德决定论和道德至上主义色彩。现代新儒家对儒家道德的推崇以及对西方道德危机的渲染,实际上是在推行被他们自己批判过的文化比较上的强人政策即“以自己文化的精华和敌对文化的糟粕进行比较,为的是突出自己文化的优越性”^①。如果说自由主义的西化派推行的是“用中国文化的糟粕和西方文化的精华进行比较”的“弱者政策”,那么现代新儒家推行的则是用中国文化的精华与西方文化的糟粕进行比较的“强人政策”,二者均有自己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当然,现代新儒家对科学主义或科学万能论的批判,对功利主义和“算帐的人生态度”的不满,在现代西方伦理学界亦能找到它的同盟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代表人物如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均对西方伦理文化的弊端和西方社会的病态作出过深刻的批评。

人类正在走向 21 世纪。20 世纪未完成的伦理文明建设任务

^① 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45 页。

必然延伸至 21 世纪。伦理文明建设离不开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承前启后或继往开来仍将是 21 世纪伦理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现代新儒家也必将走向 21 世纪。立足于世纪之交亦是千年之交的角度总结并探求现代新儒家的伦理思想,不仅有助于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的未来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因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本国批判地继承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伦理文化的精华,而又面向世界广泛吸收一切人类伦理文化包括西方伦理文化的优良之处,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而作一辩证的创造。可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内在地包含有批判地继承儒家伦理思想特别是现代新儒家所阐发和创立的伦理思想。现代新儒家 70 余年的发展,在伦理思想方面取得了不少突出的成果,同时也留下许多亟待总结的经验教训。也许可以说,无论是借鉴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的成果还是总结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的教训,对于推动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建设来说,总不失为一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